



志博云天,神舟二十号航天员接力逐梦苍穹

4月24日,由陈冬、陈中瑞、王杰组成的神舟二十号飞行乘组驶向中国空间站,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。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应用与发展进入新阶段。时值第十个中国航天日,我国人造卫星发射55周年,《文萃报》邀您一同阅读三位航天员的故事,感受他们逐梦过程的澎湃激情。

“老将”陈冬三巡天宇

航天员陈冬执行过神舟十一号、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,时隔两年再次担任指令长。

9年前,神舟十一号发射瞬间,陈冬与景海鹏“爽不爽”的对话成航天名场面,彼时的他是青涩新手,满是对宇宙的憧憬。3年前,他以指令长身份与刘洋、蔡旭哲执行神舟十四号任务,站在机械臂上,头顶浩瀚深空,他看到了空间站“T”字构型全貌,还感慨地球如青花瓷般美。

如今,陈冬再度作为指令长出征,岁月让他更沉稳。此

次他要带领两名年轻第三批队友执行任务,责任和压力更大,他更注重传帮带,助力队友成长。

陈冬是第二批航天员中首个三次飞天的,但他并不在意纪录,认为数字代表责任,飞得越多越要做好表率。队友王杰评价他训练以身作则,要求严格。经过长时间训练,乘组三人默契融洽,跑步都能“同频共振”。

陈冬是飞行员出身,操作能力强、思维敏捷、性格随和;队友陈中瑞也是飞行员出身,操作与思维俱佳;王杰是科研

人员出身,认真严谨、理论功底深厚。陈冬对团队充满信心:“合,三头六臂;分,独当一面。”

陈冬在执行神舟十四号任务期间创作诗歌《祖国梦》,字里行间满是对祖国的赤子之心。驻留太空时,他常透过舷窗凝视地球,心中五星红旗闪耀。他深知400公里空间距离抵不过心灵相连,“祖国送我上太空,我为祖国守天宫”。

工作之余,陈冬投身航天



科普,关注青少年教育。他走进校园,孩子们眼中闪烁的渴望让他倍感责任重大。有学生称他为“陈冬学长”,想成为像他这样的航天员,陈冬鼓励孩子们让祖国为他们骄傲。对自己的双胞胎儿子,他同样满怀期待:“小时候他们不太懂我的工作,看到我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里,只觉得爸爸‘好像挺牛的’。希望这次任务后,他们能真正理解我的工作,把‘好像’去掉。这对他们也是一种教育方式。”

陈中瑞:从“开拖拉机”到“开飞船”

场,早起跑步、跟着体育特长生练习、自学武术。终于,空军招飞时,他体检一路绿灯。

2003年9月,19岁的陈中瑞进入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,成为一名飞行学员。同年10月15日,杨利伟驾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。陈中瑞没想到,自己很快与航天英雄有近距离接触。一次下雪天,杨利伟来学校作报告,他从陈中瑞身边经过,虽只是匆匆一眼,却让陈中瑞热血沸腾。

2018年,中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,陈中瑞意识到位,空梦或许近在眼前,他毫不犹豫报名。严苛选拔持续数月,

王杰:从牧羊少年到航天员

阔,渴望走出大山、草原去探索世界。高三校庆时,“飞豹”歼击轰炸机总设计师陈一坚的事迹让他深受感染,高考填报志愿时,他毫不犹豫选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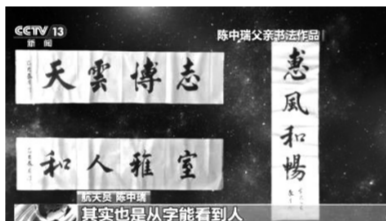
王杰顺利被录取,他坐了20多个小时硬座,第一次走出内蒙古。大学期间,他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,学飞行器制造专业,车铣刨磨锉样样精通,电工学、材料力学常拿满分,还通过英语、计算机考级,课余兼职做家教。2011年,他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,一年后获得硕博连读机会。从事科研虽漫长痛苦,但他享受其中,人生目标逐渐清晰——

战友不断离开,终于在2020年9月,陈中瑞和其他17名队友入选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。

恰逢中国空间站任务开启,两年多时间要完成八大类上百门课程学习和考核。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艰难无比,基础理论学习就是巨大挑战。30多岁的陈中瑞重回课堂,一年内学完30多门理论课程,热力学、轨道力学等专业课完全陌生,他只能白天学,晚上学,公寓的灯很少在12点前熄灭。

确定入选神舟二十号乘组后,陈中瑞在每次大型试飞、大项操作中追求极致,对任务流程、操作手册反复背记,烂熟于心,一遍遍推演、练

习。指令长评价他性格随和、心理素质好、沉着冷静、思维敏捷、操作上手快、让人放心。



陈中瑞觉得自己父亲写的字挺好看,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字写得好看,还可以透过字看到一个人。在“太空出差”之前,他瞒着用途,向父亲索取了墨宝,“志博云天”等几张书法字诠释了父亲对他的期许,陈中瑞也将书法作品和家人、朋友的照片一同带上了太空。

成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。

2018年,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启动,范围扩大。当时办公室最年轻的王杰符合条件,抱着“试一试”的态度参加。他在层层选拔中表现出色,于2020年9月正式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。

然而,挑战接踵而至。体测3公里时,他被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同批航天员“套了圈”,模拟失重水槽出舱活动训练更是难上加难,一次训练长达五六个小时,他常体会到“手抖得筷子都握不住”的脱力感。此外,身为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他“上手慢”,和航天驾驶



员队友相比,他常琢磨操作步骤背后的原理。为和队友步调一致,他常给自己加练,还随身带笔记本记录知识点,做了10多本笔记。

经历4年多艰辛训练,王杰终于成为神舟二十号航天员。此次飞天,他准备带上笔记本记录体会感受,还打算带上家人照片。他感激父母“散养”式教育,让他懂得吃苦和担当。回望来时路,王杰感悟到:人生要有梦想,当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“交会对接”,并为之奋斗,每一分努力都熠熠生辉。(本版稿件综合央视新闻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河南日报微信公众号等)



“音乐鞋匠”金复载

作曲家金复载(1942年出生于上海)的家里挂着《哪吒闹海》《三个和尚》和《雪孩子》的海报,那是他在上海美影厂当“音乐鞋匠”的珍贵印记。近60年来,金复载不仅为《济公》《清凉寺钟声》《红河谷》等数百部影视剧配乐,还涉足戏曲、音乐剧、歌剧交响乐等诸多领域。这位“音乐老顽童”把创新视作艺术的生命。最近,由他重新作曲、配器的昆曲《春江花月夜》十周年特别版在沪上演。

如果没有办法创新,就去学习

记者:从《三个和尚》《雪孩子》《哪吒闹海》到《舒克和贝塔》,您的每一部作品的风格都不相同。

金复载:那时候有一种创新的氛围——每写一部作品都尽量不重复自己。如果没有办法创新,就去学习,无论是西方的、现代的还是民族的,只要能想到的,都尽量去学。当年大家的杂念比较少,不是为了追求商业价值,而是本着艺术的规律来创作,不少作品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打磨完成。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是很难想象的。商业化的流水线模式,很难打造出真正具有艺术精神

“音乐老顽童”的先锋音乐尝试

记者:很多人熟悉您,是从您为上海美影厂配乐的动画片开始的。请问您是何时与戏曲结缘的?

金复载:早在1991年,我就为梁谷音主演的昆曲《婉容》作曲,用大提琴和钢琴取代传统的伴奏乐器,这种形式在当年是比较新颖的。此后,我还为交响乐版《牡丹亭》写

过管弦乐伴奏……此外,我还写过交响音乐剧《月满长生殿》、室内乐版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等。我相信,音乐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戏剧语言,传递戏曲艺术的魅力。

如果没有办法创新,就去学习

记者:从《三个和尚》《雪孩子》《哪吒闹海》到《舒克和贝塔》,您的每一部作品的风格都不相同。

金复载:那时候有一种创新的氛围——每写一部作品都尽量不重复自己。如果没有办法创新,就去学习,无论是西方的、现代的还是民族的,只要能想到的,都尽量去学。当年大家的杂念比较少,不是为了追求商业价值,而是本着艺术的规律来创作,不少作品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打磨完成。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是很难想象的。商业化的流水线模式,很难打造出真正具有艺术精神

“朋”与“友”有何不同

柳宗元和刘禹锡有着共同的理想,立志革除宦官垄断等政治旧弊,推行“永贞革新”,被世人合称为“刘柳”。

在革新失败被贬的十年里,柳宗元和刘禹锡共同经历了人生的低谷。柳宗元的母亲在永州去世,而刘禹锡的妻子在朗州病逝。在“千山鸟飞绝”的人生孤境中,他们成为彼此最重要的精神支柱。柳宗元每次写了新的诗词或文章,都会第一时间寄给刘禹锡看,而刘禹锡也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。当刘禹锡被再次贬到播州时,柳宗元考虑到刘禹锡的老母亲已年过八十,受不了颠簸之苦,

的作品。
记者:除了对跟风与重复说“不”,您还有哪些创作“秘诀”?

金复载:作曲靠的不只是技术,闭门造车是写不出好音乐的,尤其是在创作电影音乐时,我会尽量去拍摄现场下生活。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随科教片《中国冰川》的摄制组去西藏采风,上过珠穆朗玛峰,站在海拔6000多米的冰塔林上,我感觉自己太渺小了。后来我为电影《金色的大雁》写音乐时,又对西藏的音乐进行了大量研究。1995年,电影《红河谷》的摄制组找到我时,过去的种种积累就化作了音符。

从事“服务行业”,甘当“鞋匠”

记者:除了为影视剧、戏剧写音乐,您还写过琵琶协奏曲、长笛协奏曲、交响曲,广受好评。创作这类独立的音乐作品时,您有哪些不同的感受?

金复载: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“服务行



业”。戏剧也好、影视剧也好,都是为戏服务的,音乐只是集体创作的一部分。我就像一个鞋匠,既要为对象服务,制作出合脚的鞋,又要做出自己的风格。而创作交响乐,是一种纯粹的个性化的内心表达,需要抛开这种“鞋匠思维”,这是很困难的。

记者:这么多年甘当“鞋匠”,会不会有遗憾?如果当年从作曲系毕业后从事西方音乐创作,如今会是怎样?

金复载:我很少纠结于过去,心里永远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我一直相信,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掌握的,但一旦遇到机遇,就不能放弃。

(摘自《解放日报》4.11 陈俊珺/文)

古人不敢自称“我”

在古代,公开自称“我”会被大家讥为不懂礼仪。

据考证,至少从晋朝开始,各级官僚已经不习惯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代自己了,他们热衷于自称“下官”以显示自己的谦卑。唐人虽然旷达,但在相互交往之时依然羞于自称“我”,而是用略显青涩的“小生”来指代自己。宋朝则再进一步,那时的官僚喜欢自称“卑职”,普通人则更愿意自称“晚生”。当然,也有人循此例。

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八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人,此人姓许,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用谦称,什么“小生”“晚生”统统与他绝缘。“贾魏公为相日,有方士姓许,对人未尝称名,无贵贱皆称‘我’,时人谓之‘许我’。此人言谈颇有可采,然傲诞,视公卿蔑如也。公欲见,使人邀召数四,卒不至。又使门人苦邀致之,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。门吏止之不可,吏曰:‘此丞相厅门,虽丞郎亦须下。’许曰:‘我无所求于丞

相,丞相召我来,若如此,但须我去耳。’不下驴而去。门吏急追之,不还,以白丞相。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,终不至,公叹曰:‘许市井人耳,惟其无所求于人,尚不可以势屈,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?’”

不论面对何人,这位许姓老兄都自称“我”,这在当时居然引起轰动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,在当时的人们看来,能自称“我”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。(选自《读者》2025.7 郭灿金/文)

桃花源时间

中国古代关于时间秩序的讨论中,有一种可称为“桃花源时间”的独特观念。

陶渊明《桃花源诗》中有“草荣识节和,木衰知风厉。虽无纪历志,四时自成岁”的诗句。“纪历志”就是一般人的时间观。

“纪历志”这种“山外人”的时间观之外,还有一种时间观,所谓“四时自成岁”,即“桃花源时间”。山中无甲子,桃花源中人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他们虽然没有“山外人”的时间和历史观念,但草木自枯荣,让他们可以根据生命的节奏,来“知”“识”生生的变化(如“草荣识节和,木衰知风厉”),这“知”“识”,不是知识的分别,而是随运任化、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态度。

桃花源时间既非主观的“知识时间”,又非客观的“自然时间”,而是一种“生命时间”。这种生命体验时间观,深刻影响到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和形式创造。哲学和艺术,就是给试图逃过时间魔掌的人提供一些韬略的劳作。在一些中国传统为艺者看来,人要有捅破时间之皮的勇气、智慧和手段,这样才能度过有意义的人生。

(摘自《四时之说》朱良志/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)

主动请求与刘禹锡对调贬所,并表示“即使是因此获罪,也绝不反悔”。

柳宗元去世后,刘禹锡很快赶来为他处理后事。此后二十多年,刘禹锡耗尽毕生之力,亲自把柳宗元的孩子抚养长大,并整理柳宗元的遗作,全力筹资刊印,使其得以问世。

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可以同生共死,共患难,不论得失,无关名利,创造一切有关人类友谊的生动传说,甚至还能超越时空,跨越种族国界,在灵魂深处撞击出震彻寰宇的回响。

(摘自《意林》鹿鸣/文)